

古史新谭

史海钩沉

郑成功有亲笔信吗?

——佚名《得侍法教帖》的作者与书者

□陈文庆

郑成功传世的书法遗迹,包括题刻、拓本及手迹等多种形式,大都真伪难辨,扑朔迷离。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一份有确切证据的书法“标准件”,以此为根据来判定其他书法作品的真伪。30年前,一次偶然的机缘,一封疑似郑成功的亲笔书信重现世间,给郑成功书法遗迹的研判带来了一线曙光。然而30年来,围绕该书信作者的认定却大相径庭,始终未能形成一致的看法。该书信是否为郑成功亲笔所书,关系郑成功其他传世书法遗迹的判定,以及南明史、中日关系史等相关议题的解读,似有进一步重审的必要。

重现世间的《得侍法教帖》

1993年5月,日本京都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,山色空蒙的黄檗山万福寺,中国学者陈智超先生正在查阅隐元隆琦档案资料。寺方从库房中取出了珍藏的五大卷轴,标签题写有《唐上诸居士书札》《诸居士书札》以及《诸和尚书札》,这正是晚明渡日高僧隐元隆琦的来往书信。

展开卷轴,一封封书札装裱在内,以往只见于史书记载的历史人物,他们的翰墨跃然呈现在了陈先生面前。出于专业的敏感,一封没有落款出处的信札引起了陈先生的注意,只见信上用行草书写着:

“得侍法教,顿开悟门。执手未几,忽又言别,唯有临风神想耳。但日国之人虽勤勤致请,未知果能十分敬信,使宗风广播乎?抑虚慕其名而姑为此举耶?倘能诚心皈依我佛,自当驻驾数时,大阐三昧。不然不必淹留岁月,以负我中土檀那之愿。况本藩及各乡绅善念甚殷,不欲大师飞锡他方,所以拨船护送者,亦以日国顶礼诚深,不忍辜彼想望之情也。要之,法雨均沾,龙天实相,弘道诚莫分于彼此,审势自不无后先,唯大师慧照之。法驾荣行,本藩不及面辞,至次早闻知,甚然眷念,愈以失礼为歉。专贴回拜,谨即附闻。名单具存。”(陈智超等编《旅日高僧隐元中土往来书信集》,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,1995年,第70页)

此信历来尚无正式名称,根据传统书帖以首句命名的原则,我们将此佚名信札称作《得侍法教帖》。陈先生看到的其实是书信的“副启”部分,“正帖”已经遗失,它真正的作者与“正帖”一同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当中。不过,从行文措辞和格式上,晚明一位纵横驰骋闽海世界的风云人物隐隐然浮出历史水面。陈先生发现,这封信的作

者自称“本藩”,而且一反常规竟然都换行顶格(《郑成功致隐元信件》的发现——介绍一批南明抗清斗争新史料》,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1993年第8期,第1页);信中还说作者“拨船护送”隐元东渡扶桑。陈先生很快意识到“作者必然是一位非同寻常的重要人物”,种种迹象都将书信作者指向了一位熟悉而陌生的人物——郑成功。

现存的《隐元年谱》两种,都明确记载郑成功派遣船只护送隐元东渡日本。通过对隐元出海时、地的考察,陈先生认定佚名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正是郑成功,以此为据,推论隐元与郑成功关系“特殊”,是郑成功的“亲善使者”,可能还肩负着向日求援的政治使命。

《得侍法教帖》重现世间后,学界基本认同陈先生关于书信作者的判定,但对其“亲善使者”的说法却应者寥寥。进入新世纪,随着隐元隆琦研究工作的推进,关于《得侍法教帖》的作者问题出现了新的说法。林观潮先生在《隐元全集》中爬梳出《复软合许居士》一信,发现此信与佚名《得侍法教帖》多有暗合之处,提出了惊人说法,认定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正是许钦台(林观潮《隐元禅师评传》,厦门大学出版社,2010年,第209~216页)。

许钦台何许人也

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另有其人,确实是惊人言论,为佚名书信的解读打开了新思路。林先生通过文本细读发现,隐元《复软合许居士》与佚名《得侍法教帖》存在诸多关联,最直接的证据是《复软合许居士》中有“来喻”弘道莫分彼此,审势不无后先”一句,这在《得侍法教帖》中可以找到相同句子,两封信正是一组往复函稿;另一证据,“若问归山何日,既涉远涛似难自由”是对佚名书信“屈指归期,竟知何日”一句的回应。

我们先分析间接证据再考察核心证据。隐元东渡后,国内僧俗两众都有劝归者,相关来往书信甚多,归期回答在这些书信中俯拾皆是。林先生对“大檀护念有素”的解读亦值得商榷,该处其实指的是隐元日本登岸后仰赖许钦台的帮助,而非指许氏在厦门促成其顺利东渡。核心证据“弘道莫分彼此,审势不无后先”一句在隐元《复长崎诸居士启》中另有出现(《隐元全集》第5卷),应该是隐元原话,许钦台正是侨居长崎的护法居士。

隐元在《复软合许居士》中说许钦台曾主持福清黄檗祖庭,而且发挥了根本作用,希望许氏能全始全终,继续护持祖庭。许钦台何许人也,而能周旋于郑成功与隐元之间,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问题。

根据林先生研究,杨英《先王实录》和江日升《台湾外记》两份郑成功史料并未发现相关信息,推测许氏并非郑成功重要幕僚;另据隐元《软合许居士小影》所说的“名扬华夏,德泽海岛”,判断可能是郑氏家族下属的贸易商人。

我们借助《台湾文献丛刊》数据库,检索“许钦台”“软合”等关键词,未见相关条目出现,可以基本断定许氏不在郑成功军政系统当中。问题来了,作为一个不在明郑集团中枢权力体系之内的海商,是否有此能力量护持黄檗祖庭,并使隐元对其寄予厚望呢?

江户时期,日本实行锁国政策,只留长崎一地作为通商口岸。明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,明朝重新开放中日贸易航线,东渡长崎商贾的侨商与日俱增,其中又来自福建沿海的福、兴、泉、漳四郡为主。为了适应华侨佛教信仰需求,长崎先后兴建了三座寺院,统称“唐三寺”,其住持均由中国僧人担任。这是隐元东渡的社会背景,其东渡后在日弘法也需要当地侨商的支持和斡旋。

作为侨商,许钦台在长崎有其影响力;作为明郑集团所属海商,可以向当局进言,亦极有可能亲近郑成功。郑成功为从事对外贸易特别建立山海并轨的五商组织,陆路五商驻地杭州,负责采购江南生丝和药材;海路五商总部设在厦门,是负责对外出口的派运机构(吕荣芳《郑成功的五大商行》,《南安文史资料》第9辑)。

郑成功时代,厦门成为东亚商贸中心,与日本长崎往来频繁。推测许钦台是海路五商之一,经常往来厦门、长崎之间。这样的身份就能符合隐元所说的“名扬华夏,德泽海岛”了。许钦台有经济实力,又有政治背景,又是虔诚的佛教徒,隐元自然对其寄予厚望。若上述身份认定成立的话,隐元《复软合许居士》的书信内容才能读得通。

我们已经证明,《得侍法教帖》与《复软合许居士》相互暗合的所谓证据不足为凭,但仍然不能排除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为许钦台的可能性。

作者·书者·读者

如何正确打开《得侍法教帖》,我们需要理清作者、书者与读者三个层次。只有把作者与书者分开,书信中的一些矛盾才可自圆其说。

作为现代的读者,重点是如何充分利用佚名书信的史料价值。我们先来看《得侍法教帖》的作者,也就是书信行文的主体是谁。毫无疑问,书信的第一人称是“本藩”,只能是自称,不可能是他称。郑成功在(南明)隆武二年(1646年)被授为“招讨大将军”(朱希祖《郑延平王受明官爵考》,

《台湾文献丛刊·郑成功传》附录),从此对外一直以“本藩”自称。

林先生在杨英《从征实录》和江日升《台湾外记》中找到“本藩”为他称的例子。其实《台湾外记》凡涉及“本藩”之处,皆为转引自郑氏三代及耿精忠的自称,并非他称。杨英《从征实录》的确定在“本藩”来指代郑成功的例子,但更多是以“藩”“藩驾”来称呼。仅此亦可看出,以“本藩”来称呼郑成功并非当时的惯例。

《从征实录》以年月系事编辑,通过详细梳理“本藩”的用例,我们可以发现,每条事件的开头在涉及郑成功名讳时皆以“藩”“藩驾”来称呼,用“本藩”的只出现在正文当中。该书是明郑户官杨英根据郑氏六官文书档案编辑而成,因多触讳,清代一直以抄本行世,并未刊行。以“本藩”称呼郑成功的条目大概是转引自六官案卷而来,抑或传抄致误。

作为郑成功下属的海路五商之一,许钦台绝不致僭越;作为隐元隆琦的护法居士,行文应该谦恭有礼,而非霸气外露。《得侍法教帖》作者是许钦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按照传统书信来往礼仪,遇到对方名讳一般抬头(换行)顶格或空格,以示尊敬。在《得侍法教帖》中,“本藩”一词一律换行顶格书写,如果是自称不当如此,该如何解释呢?可以大胆假设,《得侍法教帖》的书写者并非郑成功本人,而是由他人代写,“本藩”一词顶格自在情理之中。联系到“弘道莫分彼此,审势不无后先”一语许钦台曾经用过,不排除书写者是许钦台的可能性。这就可解释为何《得侍法教帖》会说作者曾在厦门会晤过隐元,而实际上两人并未见面,代笔者其实并不知情,或者是客套话。

无论从佚名书信自身透露的信息,还是结合当时社会背景,《得侍法教帖》由郑成功授意而由他人代拟的可能性最大。那么,郑成功是否有“写信”的动机呢?这是书信作者判定中需要明确的一个前提。作为晚明东亚世界的宗教领袖,隐元及其僧团无疑是一股重要的精神力量,在处理明郑集团内部关系及对日关系上,都可以善加利用,从郑成功的战略眼光看,是不可能不知道,也不可能不重视的。

《得侍法教帖》并非出自郑成功手笔,但仍能代表郑成功的意图。作为现代的读者,我们可以根据书信解读晚明佛教、南明史、中日关系史等相关问题,还可以借助书信真迹窥探晚明书法风尚。至于书写者何人,终究文献不足征,我们还无法确切了解真实情况,有待于将来新资料的发现。
(作者单位: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所)

乡土横记

福州仓山金山寺

□潘慧雅 张春英 文/图



金山寺



金山寺塔

金山寺原名金山塔寺,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,位于闽江下游乌龙江上,寺庙四面环水,寺随江动,水绕寺转。原是江心的小石埠,因其形状像石印浮于水面,故曰“小金山”。但因地处江心,易遭洪水侵袭,现在的金山寺是1934年重建的。

前殿为天后宫,供奉着妈祖娘娘,昔时洪塘是出入闽江的要道,商贾、船民在启航出海前,要先祭拜妈祖保佑顺风和安全。妈祖殿后墙上的横匾“是最胜处”,为1935年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游寺时所书。

大慈楼位于妈祖殿正后方,是金山寺的主殿,供奉着西方三圣——代表光明与生命的阿弥陀佛、代表大慈大悲普救人间疾苦的观世音菩萨、智慧之光的大势至菩萨;三圣的两侧分奉着地藏王菩萨和目犍连尊者。

大慈楼前的左厢房是怡怡斋,是古时学子读书的地方,现在这里供奉的是伽蓝菩萨,以感恩伽蓝菩萨护法护教的殊胜功德。大慈楼前的右厢房借借室,是当年三一教主林兆恩的寓

居之所,林兆恩曾于此著书立说并为倭患死者建造普度,因普度用的器具都是向周边的村民借来的,所居之所也被称为借借室,后又被称为三一教主祖殿,敬塑金身供人敬拜。

福州河流众多,先在江河以及一支支流畔建有不少塔,但直接位于江中的塔较少。金山寺的金山塔主要的作用是船舶航行标志,建于五代时期,高约十米,由185块白梨石砌成,是座七级八角实心石塔。金山寺依塔而建,在石塔建成数百年后,于宋代绍兴年间在塔的周围修建殿堂、厢房等形成寺庙。金山寺塔也被称为“浮屠金印”,眺望寺塔,犹如一方带柄的金印。

金山寺前殿正门有一副对联,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讲学时所题:“日夜长浮,不用千篙争上水;乾坤屹立,独能一柱抵中流。”上联写出金山寺特殊的“水中寺”的建筑特色,江水绕寺而流,远望金山寺,仿佛一条逆水而行的船,力争上游。下联则写出金山寺屹立江中的气势。金山寺地理位置特殊,空间有限,其古

树名木按作用可分为两类:一类是景观植物,南端有一棵百年榕树,不仅点缀寺院,还起到了障景的作用,让游人自江中上岸以后无法一览寺庙全景,而产生了“探幽”的心理。该古榕树上世纪60年代因台风损坏后,在1992年被重新种植,现已长成一棵参天大树,犹如重生之风,在夜景灯光的投影中更加的灵光四射。

另一类是祈福植物。在金山寺位西方向有一棵古樟树,是明代万历年间状元翁正春亲手所植,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。古樟树高20多米,两人合抱才可,离地3米高的地方又生一横枝把两枝相连紧紧地抱在一起,似一条虬龙盘在树上,枝干相连,人称连理树、爱情树。因它生长在西方,沾大慈楼三圣菩萨雨露,又被称为菩提树。学子在树下求金榜题名,所以又被誉为了状元树。

金山寺中的水与山石相伴而生,因潮汐的原因,每日有两个时段的水位是最低的,这时被淹没的礁石便会露出水面,形成天然的石

桥,从礁石走到金山寺只需半分钟左右。时至今日,洪塘一带的渔民相信,金山寺之所以能“从潮升降,水涨山升而不淹没”,是因其所建的岩石是鼉的化身。潮落鼉则下潜,潮起鼉则上浮,即使洪水泛滥,古寺也会在鼉志心耿耿的守护下安然无恙。

金山寺不仅景色优美,还是福州洪塘地区的文化摇篮,明朝名将张经、学者林龙江、状元翁正春和吏部尚书曹学佺相继读书、著作于此。金山寺虽因地形限制,没有巍峨的殿堂和巨大的佛像,但却小巧精致,是福州唯一的水中寺庙。

金山寺岸边的清水亭畔是著名的洪塘古渡口。明万历乙未年(1595年),洪塘乡绅在金山寺造桥以通人,但文人墨客认为“通以桥反损佳趣”,在翁正春的主持下,拆除了石桥。时至今日香客想要入寺,仍需小舟引渡。江岸距金山寺70余米,船只需不用桨,有麻绳相连,船公双手交替拉拽麻绳,惯力带动船只前行,远离岸边,驶近金山寺。

隐元、费隐与叶向高的关系

□郑松波

为纪念隐元禅师圆寂350年,2022年2月25日,日本皇室第七次为其加封谥号“严统大师”。据黄巽文化学者林观潮解读,“严统”意为“庄严传统”,指的是庄重严格地传承文化道统,该用语源于汉籍文献的出典,褒扬了隐元禅师的巨大功德。

1653年(清顺治十年,南明永历七年),隐元隆琦的嗣法本师费隐通容(1592—1660年)编撰印制禅宗史书《五灯严统》,流传于中日两国,使得“严统”用语广为人知。隐元东渡日本后,重新刊印《五灯严统》,作《重刊五灯严统跋并赞》,赞扬本师费隐的功德。日本皇室加谥时“严统”用语的选择,也是对隐元尊师重道的赞扬。

费隐是明末临济宗著名高僧,出生于福清江阴里松岗村,先祖为瞻阳望族何氏,瞻阳即今日福清市头头镇古阳村古称。对此,《费隐通容禅师纪年录》有载:“师讳通容,号费隐。闽之福清江阴里何氏子。其先瞻阳望族也。”

费隐和尚自幼即英异绝伦,博通经论。14岁出家于福清三宝寺,历参无明慧经、湛然圆澄诸师。1623年(明天启三年)参谒密云圆悟,遂顿悟见地,并嗣其法。1630年(明崇祯三年)七月,在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受密云禅师付法,为临济宗第三十一代传人。3年之后,历主黄檗山万福寺、蓬峰寺、浙江天宁寺、江苏超果寺、福严禅寺、万寿禅寺、维摩寺、尧峰山兴福寺等诸刹,皆能复兴古刹、传扬圆悟之法道,大振临济宗风。1633年(明崇祯六年)主黄檗,延隐元入西堂,3年后退隐,由隐元隆琦承继法嗣。至此,密云圆悟、费隐通容、隐元隆琦三代先后主持福清黄檗山,同声唱道,一时成为禅门盛事。费隐通容法嗣计有隐元隆琦等64人,门下法脉兴盛,传承至今,影响波及于日本与东南亚。

叶向高(1559—1627年),字进卿,号台山,晚号福庐山人,别号紫云黄檗山人。他历官三朝,万历、天启年间二度出任内阁辅臣,独相七年,首辅四载,是晚明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。

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始建于唐,鼎盛于宋,衰微于元,重兴于明。明嘉靖年间,福建沿海屡遭倭寇侵扰,1555年黄檗山万福寺被抢掠一空,焚毁殆尽,千年古刹成荒野之地。1567年,正圆禅师志图恢复,上京请求御赐藏经,重建宝刹,未果。1614年,其徒孙兴寿、兴慈二僧承师遗愿,驻京奏请,得内阁首辅叶向高举荐,神宗万历皇帝御赐藏经、黄金、紫衣等宝物,并赐匾“万福禅寺”,黄檗山万福寺得以重建,寺名也沿用至今。请辞获准返乡的叶向高捐银400两,建藏经阁。可以说,没有叶向高,也就没有日盛一日的黄檗山万福禅寺。

叶向高是今福清市头头镇后叶村人,与瞻阳村相邻。据林秋明《三朝名相叶向高》一书所载:叶朝荣有十个子女,早夭三男一女,余四男二女,即长子叶向高,次子叶向亮,三子叶向永,四子叶向亨,长女叶默适林守定,二女何氏妹适何乾斗,何乾斗系古阳何氏第十二世孙。因此,当时瞻阳称叶向高为“姻舅”。

叶向高《苍霞余草》第七卷收入了叶向高所作的《蒙山何氏族谱序》,文中记述了1616年(明万历四十四年),“谢政归田”两年的叶向高因其“宗老来谋于余,图修阙事”,而亲自援笔为其作“序”的缘由。“序”中还明确指出“余家与何,相距咫尺,世世为婚姻”的事实。

据瞻阳村何氏宗祠文字记载,叶向高还为蒙山瞻阳何氏撰行序表字。瞻阳村文史爱好者何荣基考证《何氏族谱》记载:瞻阳何氏十二世孙何其族,生二子,次子懋渊,为僧号费隐。由此可知,按辈分算,叶向高与费隐禅师是舅甥关系。

叶向高的孙子叶益蕃、曾孙叶进晟等,秉承先人复兴黄檗山的行愿,相继成为黄檗山的檀越。

1629年(明崇祯二年),叶益蕃担任黄檗山檀越代表,与其他僧人共同发起,邀请费隐通容的师父密云圆悟前来黄檗寺住持。

叶进晟与隐元禅师关系密切。黄檗山作为明朝遗民、反清志士的避难栖身和听法问道之幽境,来往人士众多。叶进晟“隐公久住黄檗山,山中往来人如蚁”诗句,可以想象当时情形。1648年(清顺治五年),当福建连江失守消息传来时,身患血症的钱肃乐以头触柱,不日死于船中,以身殉国。钱肃乐遗体无法归葬故乡。6年后,叶进晟与隐元禅师会同为钱肃乐治丧,并将其移葬福清黄檗山。

当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后,叶进晟还去信表达了对隐元禅师的怀念之情,隐元禅师也复信叶进晟。